本版编辑：戴 菁 版式设计：王 芳 E-mail:f6@studytimes.cn Tel:010-68929216

观津书院：延续文脉 承古推新

□ 韩志武 董明发

据清同治十一年《武邑县志》记载，在河北省衡水市武邑县，曾经有一座远近闻名的官办书院，名曰“观津书院”。该书院因古时武邑县曾有“古观津”之称而得名，纯正的学风为清代武邑县及周边地区文化传播与振兴发挥了重要作用。书院存续期间，多延聘名师主讲，不仅培养了大批学识渊博之士，而且产生了多位颇有名气的具有革新意识的桐城派学人，使观津书院影响深远。

自古以来，“古观津”就是文化博兴的著名城邑，且此地历来名人辈出。战国时期，赵惠文王曾封大将乐毅于此，号“望诸君”，其文《报燕惠王书》彪炳史册。西汉孝文皇后窦猗房即清河郡观津人，辅佐文景武三位皇帝，母仪宫范，被誉为“一代贤后”。西晋武邑张载、张协、张亢三兄弟，齐名文坛，堪称佳话；后魏武邑名儒刘兰，曾于中山设学讲经书，弟子前后数千。尽管在隋唐时期，观津地域并入武邑县，但是历史积淀的观津文脉经久未衰。直至明清之际，武邑文人俊士仍多以“观津人”自称。

（一）

观津书院始建于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由武邑知县雷五福、训导乔景岚劝谕士民助资创建。雷五福，字鹤峰，陕西朝邑人，进士，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任武邑知县。书院创建之初，劝捐甚难。知县雷五福首倡，学师同心捐助，共得一万一千五百五十缗，庀材鸠工，前后历时四年，方才规模初具，前大厅、中讲堂、后厅、东西廊及左右斋舍无不齐备。因书院地处武邑县城东街县学旁，故又称作“武邑书院”或“东街书院”。

书院自创建以后，秉承深厚的古邑千年文化底蕴，山长（或主讲）多延聘名师担任。经考证，观津书院第一任山长为著名讲师戴襄清。戴襄清，字凫川，宁河人，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任武邑县教谕，后主讲观津书院。史料记载，清道光丁未科进士杨书香（武邑人），即师从乔景岚与戴襄清，后官至鸿胪寺正卿，当地时称“杨翰林”。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冬，知县侯绍堂（杞县人）与戴襄清等人晤谈，确定书院董事四人，在了解有关书院创始、筹经费、定章程等事宜后，修订了《书院章程》，并撰文勒石以记。

（二）

郑骧，字筠似，一字云史，江西金溪人。曾于光绪十年（1884年）至光绪十三年（1887年）间署理武邑。由于并非科甲出身，本应署理一年为限，而知州吴汝纶为其“请于大府”，留任三年，以竟其事。其间兴复观津书院，建讲堂、斋舍，然后定教条、聚生徒，购书迎师，并增建试院，余钱收息养士，观津书院堂室斋庑焕然一新，架阁之书无不齐备。

在观津书院得以兴复之际，诗联大家范当世当即撰联两副，其一为代郑大令骧观津书院联：“自来学校以书院辅之，如今比屋东西，稍有欢颜在风雨；吾为父兄望子弟成耳，此后一官南北，还将老眼看云霄。”其二为代吴剌史汝纶观津书院题赠郑骧联：“明公家法有礼堂手订之经，异日当成通德里；此地昔时多燕赵悲歌之士，为我一吊望诸君。”

（三）

范当世，原名铸，字铜士，后改无错，号肯堂，又号伯子，江苏通州（今南通）人，清末文学家、诗文名家、桐城派后期作家，以诗、古文闻名于世。光绪十一年（1885年），范当世应冀州知州吴汝纶之招来冀，后应郑骧之聘，就任观津书院山长。次年春，至观津书院课武邑诸生，士风大振。两月后参加书院月课的举贡生监齐集书院，“庭隅狎坐皆满，或至不容而露坐阶下”。范当世出任观津书院山长期间，声名远播，慕名求学者甚众，造就了衡水刘乃晟、武邑吴镫、南宫刘登瀛等一批桐城派弟子，其中以吴镫学问最大。吴镫，字凯臣，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科进士，官工部主事，曾参与维新变法，有《读欧史桑维翰景延广传》一文与《追和杜工部偶题元韵》诗一首传世。

（四）

光绪十四年（1888年）七月，范当世南归赴乡试。之后，观津书院在历任知县、教谕的管理下，学风纯正，优秀士子层出不穷。其中，章绍洙署武邑知县时，官课亲自阅评，从不假手于人。章绍洙课卷评语最为高允，冀州信都书院贺涛诸弟子多假托武邑籍应其官课，求其一语而为荣耀。

清同光年间，在“曾（国藩）门四弟子”张裕钊、吴汝纶兴学造士的倡导下，桐城学派实现北移，强调培养人才、兴国富民。一方面，桐城派古文义法及诗学在深、冀二州广为传诵；另一方面，放眼世界，创办新学，为畿辅之冠。观津书院尽管只是一县之书院，同样时兴实学之风。据记载，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观津书院设有“西学”。栗如桐，字琴斋，武邑人，求学期间专精西国文字算数和中外掌故风俗，后以全省第一名毕业于直隶高等学堂，其英文算数为全省之冠。光绪三十年（1904年），观津书院改为武邑县官立高等小学堂，在知县李绮青的督理下，学堂规程日趋完备，设堂长1名、董事2名、教员2名，学生数十名。由此可见，观津书院对武邑文脉的延续，着实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观津书院的改制，并不意味着武邑文脉的隔断，那些曾在观津书院就读的莘莘学子，或东渡留学，回国后致力于国民教育；或回到故土执教，造福桑梓；或出仕为官，造福一方，将“观津文化”凝聚成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1934年11月4日，北平辅仁大学会客厅中，来自“古观津”的二三十位热血青年，组成了北平武邑县旅平同学会，旨在启发民智、救国救民。次年，该同学会在京出版了武邑县首本进步刊物《纯泉》，向古老的观津古邑撒上了一粒粒革命的种子，让这些种子在古老的土地上发芽、开花。正如武邑桐城派学人魏世麟先生在《纯泉发刊祝词》中说道：“溥博源泉，时出无穷。纯洁澎湃，显示光灵。旧污以洗，众秽以清。禹鼎秦镜，秉持至公。桑梓先鞭，迈进大同”。

千年古邑，文脉厚植；于斯滋盛，以志永续。2020年夏，一座崭新的“观津书院”在环境宜人、景色优美的“观津公园”内落成，庭院悠然，依旧散发着浓郁的书香，对武邑悠久历史文化进行传承与创新。

书院寻踪

彰显君子人格的公共性情怀

□ 朱 承

“君子”不仅是个人修养中所展现的优良品格，也是营造良好公共生活中所不可或缺的典范式人格气质，具有公共性意味。我们说，人不能脱离公共生活，小到应对血缘宗法共同体，大到参与政治共同体，都是人的公共生活状态。在公共生活中，为了形成和维护一定的公共秩序，保证人从原始状态进入文明状态进而实现理想中的美好生活，需要人们具有特定的、适应公共生活的人格品质。

在儒家文化的语境中，君子往往指的是品德高尚、能力出众的人，既是人们对于理想人格的一种指称，也是对德性和能力出众之人带有赞美意义的评价，在引导个人道德修养、维系公共秩序和推动社会进步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君子的言行举动对于公共生活具有示范性引导性价值，是人们所普遍认同的一种人格标识，因而不仅具有原子化的个体修养意义，还能在建设良好公共生活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君子人格以公共性优先作为个体修养原则。儒家强调和重视个体的道德修养，修身是参与公共生活的根本之所在，但是儒家的修身不是为了个体自我心性的满足，更不是仅做个“自了汉”，而是要“念头在世间”，修身是为了更好地参与公共生活、引导家国天下，其目的是要通过自我的修养带动整个共同体来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论语》上提到孔子对于“君子”公共性情怀的理解，“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可见，在儒家的视野里，君子修己指向安人、安百姓的公共关怀，个体的自我修养是为了群体的公益，修己是实现公共性目的的手段和途径。只有以参与公共生活并为公众谋福利作为修身的效果，才是人格追求的完满性之所在。正因为公共性优先原则决定了个体修养的方向，因此，君子要以实现公义作为自己人生最高的价值追求，其极致处可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也正是因为能以公共性优先作为处世原则，所以在儒家的心目中，能够“博施济众”“泛爱众”以及“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的人，才称得上是“君子”。君子人格把公共利益置于个体利益之上，以公共关怀的落实作为个体修养的最高成就，这是个体参与公共生活的重要前提。

君子人格以尊重和遵守公共秩序作为个体的行为规范。在儒家文化里，公共生活的秩序主要指的是礼治秩序，无论是政治生活还是社会生活，要想成为合格的共同体成员，必须要遵守“礼”的要求。君子人格意味着对于“礼”的认同与尊崇，个体的言行举止应该在“礼”规范的范围内进行，孔子将其称为“约之以礼”，强调“不学礼，无以立”。儒家认为，“礼”是往圣先贤参酌天地秩序为人类生活制定的规则，所谓“大礼与天地同节”，换言之，公共生活的秩序具有崇高而神圣的地位。虽然儒家也同意“礼”的内容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但“礼”所包含的秩序和规则意义则是百世不易的。良好秩序的实现，同人们是否遵守“礼”的规范是分不开的，“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君子”，就要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将自己的视听言动纳入到“礼”的规范里，以此来维护公共秩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公共规范，作为共同体的成员，必须遵循这一时代的公共规范，敦厚崇礼，才能更好地与时代相处，也才能更好地实现个人的价值。孟子说：“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对于他人和公共生活秩序的爱护与尊重，是人与社会和谐共存的前提，也是君子人格的重要内涵。君子人格内在的包含了对于正当礼法规范的敬畏和遵守，在对于礼法规范的遵守中，既成全自己也成就他人，这是个体参与公共生活的基本要求。

君子人格以公共生活的大同团结作为个体努力的目标。君子谋道、君子忧道、君子志于道，君子人格的实现是与儒家之道联系在一起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儒家把“大同”作为理想的公共生活范式，而君子“志于道”的表现之一，即是对“大同”的理想念兹在兹。在以“大同”为标识的公共生活理想里，天下为公，贤能有所用，老弱有所养，讲信修睦，人们在团结的公共生活里其乐融融。宋明儒家的“民胞物与”“万物一体”的思想，以社会团结作为理想秩序，也体现了儒家的大同理想，历来为人们所希冀和追求。儒家总是在号召人们应该为实现大同社会而努力，因此，作为理想人格表征的“君子”更应该将大同理想作为自己的志向。历代儒者都以实现大同社会作为个人进德修业的志向所在，《礼记·礼运》篇说：“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明儒王艮说：“是故人人君子，比屋可封，天地位而万物育。此予之志也。”儒者们的这些志向性话语，集中体现了君子人格将建设美好的公共生活作为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可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增进天下人的福祉，促进社会的大同团结，就成了个体参与公共生活的高远追求。

进而言之，成为君子，不只是意味着“小我”的道德理想得以证成，而且还更多的指向了“家国天下”的公共关怀，是实现“大我”的必有之义。中国传统君子将个体生命的意义融入到家国天下的平治事业中，把个体的自我成就汇聚到人类文明进步的洪流中，这种“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公共性情怀，千载之下，依然具有激荡人心的力量。

所以我认为，君子人格具有融入公共生活并努力推进之的公共维度，对建设良好公共生活所需要的成员品格具有导向性意义。在儒家君子人格的理论体系和思想传统中，积极参与公共生活、严格遵守公共秩序、着力实现公共理想等公共性精神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这种精神对于人们共同维护共同体秩序与合力为共同体理想而奋斗具有不可或缺性的意义。就此而言，当我们称道和弘扬君子人格精神时，就意味着在个体的人生道路上，有必要树立公共性的情怀并积极地参与公共生活，坚持公共性优先的处世原则、尊重和遵守公共的礼法规则，为实现社会大同的高远理想而努力。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智慧研究院暨哲学系教授）

我看君子文化

用青年话语宣讲好党的创新理论

□ 司文超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精心组织宣讲团开展专题宣讲，用好党的红色资源，让干部群众切身感受艰辛历程、巨大变化、辉煌成就。他在不同场合强调宣讲“要增强针对性和时效性、扩大覆盖面和影响力”“要加强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创新，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些重要论述为高校开展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理论宣讲指明了前进方向，是提升理论宣讲时代感和吸引力的根本遵循。

近年来，随着党的创新理论不断丰富和发展，高校大学生理论宣讲组织也与时俱进、蓬勃发展。同时，通过综合调研发现，目前，高校各级各类学生宣讲还存在着组织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象，讲师水平参差不齐，理论宣讲的质量和实效有待进一步提升。因此，高校学生理论宣讲组织要积极发挥头雁效应，用青年视角阐释党的理论，用青年话语宣传党的主张，用青年担当践行党的要求，不断将学习研究和宣传普及党的创新理论的使命任务引向深入。

设好线路。向纵深推进，走大宣讲、大联合的宣讲发展道路。学生宣讲组织要认真按照党中央对党史学习教育的统一部署，积极主动作为，汲取更多养分，多讲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引领和带动更多青年学生把党的历史学习好、继承好、发扬好。通过寻访红色故事、追寻红色印记、采访老红军老战士，自编自演话剧、舞台剧、短视频等多种途径和方法，形成善用“青年版思政课”的生动实践。

磨好课件。主动和定期邀请中央及省市、学校宣讲团的领导、专家进行备课指导，开展集中备课、联合备课、小型研讨、试讲备课、示范授课等，让真理越辩越明，让理论越讲越彻底，让宣讲技术越来越娴熟。通过文献研读、实地观摩、主动请教，课件长短结合，筑牢宣讲基本功。每个理论讲师都应善于讲短话、讲实话、讲青年话，会讲“3+X”个主题，既能宏大叙事，也可精微表达。坚持“小切口、高精度、专板块”，避免宣讲内容广而泛、大而浅、空而虚。

讲好故事。要始终面向人民群众，深入广大青年，坚持让最优秀的青年讲最精彩的故事，充分展示思想的锐度、青春的活力和专业的精神。更加主动宣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围绕“四史”宣讲，充分发挥教育优势，将“天下事”讲成“身边事”，将“书面语”讲成“知心话”，主动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主动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倾心打造“学生版思政课”的时代答卷，引导广大青年加深对“四史”的理解和把握，加深对党的创新理论的认同、理解和内化。

建好队伍。培养大批能够讲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青年人才，通过青年视野、青年思维、青年话语，让党的创新理论和红色故事“飞入寻常百姓家”。要用优秀人才宣讲先进理论，用先进理论涵养卓越人才。要下大力气培育高素质宣讲队伍，更加突出政治建设，更加注重学习调研，更加注重示范引领，更加彰显改革创新，提高讲师直接服务基层、直接服务学生的能力和水平。高校大学生理论宣讲面向专业不同的受众，宣讲主题与内容需要具备多样性、广泛性，宣讲时间与节奏需要具备灵活性、变通性。这些都要求宣讲组织注重讲师政治素质、宣讲技能和服务意识，在基层宣讲中实现“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培育塑造一批政治坚定、投身基层、乐于奉献的高水平理论宣讲人才，积极推动高校学生研习、宣讲、阐释党的创新理论，为培养一代又一代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教育”论坛